

# 论中国教育学的学术自觉与话语体系建构

□ 孙元涛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 一、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价值证成

1. 现实证成: 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时代诉求。改革开放 40 年来, 中国的综合国力已大大增强, 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也显著提升, 但是根植于中国独特社会实践而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则处于明显滞后状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转型变革实践中的原生性理论缺席和学术话语主体性失落的处境, 使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实践经验对内凝聚成具有感召力的时代话语, 对外推动中国理念和经验的国际交流和传播, 这是中国当代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历史使命。这一使命无疑是超越学科的, 但其实现又扎根于每一个具体学科中。在这个意义上, 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 并不单纯是一种技术性质的问题, 也不可能仅仅落脚于某种外在的设计和精致的包装。如若仅仅把它当作一种理智的技术操作来加以理解, 忽略其背后深重的历史使命和现实关怀, 则非常容易将话语体系建设议题狭隘地当作一项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的虚浮的表态。

2. 逻辑证成: “普遍性·特殊性”关系问题的方法论辨析。首先, 如同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轨迹一样, 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 也是在内忧外患的社会生态中, 在传统与现代持续而复杂的角力中逐渐推进的。就此而论, 在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一般性问题上, 突出“中国”特质, 是一个有着强“实体性”内涵的课题。其次, 在方法论意义上, 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逻辑合理性, 内在地要求我们重新辨析长期主导人们认识框架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中国表达等话语的合理性确证,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重要的自我启蒙: 在所谓的“普遍性”话语中进行福柯式的“考古学”, 寻绎其由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的路径。只有对西方所鼓吹的“普遍性”话语“去魅”, 还原其作为另一种特殊性的本质, “才能同时开启我们掌握自身特殊性

的契机”;才有可能为一种更为博大和真诚的“普遍性”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学术史证成: 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迷失与回归。从现代学科的意义讲, 教育学在中国的导入、传播、创生与早期发展, 与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相融相生。改革开放 40 年来, 西方教育学乃至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诸多重量级人物, 几乎都曾作为“学术明星”在中国教育学科建设中被引介、借鉴和表达。这固然体现了中国学术的开放性, 但却进一步加剧了“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因此, 在这一学术脉络中提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进而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建设问题, 符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基本原理。

## 二、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通达路径

1. 建构自觉的话语意识。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建设中的欠缺, 固然与中国教育学的起步晚于西方, 且创建之初大量引进西方理论有关, 但经过一百余年的发展, 中国教育学依然面临话语体系建设薄弱的问题, 很大程度上则与研究主体缺乏足够的话语意识、话语自觉有关。从“教育学中国化”(本土化)到“中国教育学”的自主创建, 必然包含着自主构建中国独立的教育学概念和话语体系的议题。独立, 并不意味着封闭、孤立, 也不意味着全面拒绝外来的智慧和话语资源。“对中国教育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思想’, 最终只能形成于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境脉之中, 并最终会带有‘中国话语’的特征”。这应该成为谋求独立形态的中国教育学的前提性共识。

2. 回归中国教育学话语创生的文化之源。中国教育学的话语创新, 需要在双重意义上回归本土文化之源: 第一, 中国教育学的话语创新扎根于鲜活的教育实践中。改革开放 40 年中, 两种力量的协同共进, 是中国教育学从恢复重建到日益繁荣发展的重要助推力量。首先, 教育学研究与中国教育变革实践的交互建构, 是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内在

支撑力。无论是宏观层面上富有中国特色的素质教育理念、政策和实践,还是微观层面上由教育学者共同体所自觉发起的中小学“整体改革”“主体性教育”“新基础教育”等扎根中国教育泥土的变革实践,都可以视为教育学理论与实践变革双向建构、互动生成的典范。其次,中国教育学科自我意识的觉醒,可以视为学科和“本土”双重意义上的自我反思,这种源自学科内部的反思性力量,被视为学科日益走向成熟的标志。

第二,中国教育学的话语创新,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如何在话语体系建设中真正实现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呢?有两种思路或许是值得借鉴的。其一,以既有的中国话语实现文化交流、转译中的古今融通。现代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的“位育”,可以视为体现这一话语创新的经典。其二,尝试以话语创新阐释某种中国特有的现象、经验与问题。能够体现这一思路的典型代表,当属费孝通独创的社会学概念“差序格局”。

3.在“话语的教化”中积累话语创新的力量。话语体系不仅具有标识身份、凝聚共识、培育认同的价值,而且具有非常强的教化功能。教育学者作为教育学话语的主要生产者,自身即浸润在既有的话语体系中。如果在意识和学术实践中不经历一次关于学科及其话语合法性的深刻反思,则这种自我复制式的话语生产格局还会在惯性中蔓延下去。因此,意识到话语的“教化”力量,一方面需要教育学者对自身的话语生产实践有清晰的自觉,不满足于将自身的话语生产仅仅作为西方教育学话语的“异域应用”,而是在回归本土文化之源的意义上尝试实现话语创新;另一方面,从话语创新的可持续性和递进突破的意义上,应该致力于将零散的话语创新及时转化为对学科后来从业者的教化力量,使中国教育研究中的“中国”意识由弱变强,由某个特定阶段的觉醒转化为一种可持续的学术共识。

### 三、警惕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潜在风险

1.警惕教育学话语体系建构中“本土意识”的绝对化。在学科话语创新的意义上强化“中国意识”“本土意识”,既体现着实践创新对话语的内在需求,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视为中国崛起在学术上的回响。但是,这种本土意识的凸显,既不是简单地在时间轴上向传统回流,更不能在空间维度上将自我孤立于全球文化、学术交流之外。因此,中国学术话语创新需要警惕的第一个潜在危险,是将本土意识“古典化”甚至“东方化”。这应该成为中国教育学话语创新和话语体系建设的方法论告诫。

中国教育学的现代转型,是与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彼此交融的。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性”的培育以及分别在两个维度上的生长,尽管蕴含着诸多问题,但整体上促进了中国教育与教育学的现代转型和规范化建设。因此,当代中国教育学的话语创新和话语体系建设,既不可能是对中国过往教育史和教育学术史的全面复归,也不可能是对西方教育学话语的整体“断舍离”。在话语创新议题上将本土意识绝对化,过度放大中国教育学与西方教育学的差异性、独特性和不可通约性,表面看起来是一种文化觉醒,在方法论上则未见有效突破和改进。如果学术共同体陷入要么全面追随西方,要么与西方话语对着干的钟摆困局,则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努力,可能陷入将自我隔离于现代化、全球化话语之外的境地。

2.警惕教育学话语体系建构中的“去学科化”。对学术话语体系建构课题的元分析,未尝不可以置于超越具体学科的一般性逻辑上;但是,对这一问题的实体性改进,却不能不将一般性逻辑问题,转化到具体学科层面上来运思和行动。不在这一转化程序上下功夫,就有可能使严肃的学术讨论游离于学科逻辑之外,造成事实上的“去学科化”。之所以要警惕这一潜在风险,是因为在中国教育学发展史上,曾经有过类似的案例。那个时段被标签化为“中国化”的“教育学”,几乎成为教育政策汇编和本国零散的教育经验的绝对化表达。结果是,所谓的教育学,越来越失去其学术质量和学科品性。如同我国学者陈桂生指出的,这种不成熟的学术进路,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化’掉了教育学”。在今天,记取学术史上的教训,一个可资借鉴的经验是,话语意识固然可以先行,但是教育学话语的创新,却应该深深植根于学科扎实而稳健的研究过程之中。

3.警惕教育学话语体系的“空心化”。无论是中国教育变革的历史性实践,还是中国当代教育学的话语创新,都无疑需要一种内在的主体性重建。如果我们依然习惯于直接从外部现成地获得某种貌似完备的实践经验和学术话语,满足于无批判、无反思地从他人的话语表达中抽象出一般性原则并应用到自己的学术生产和实践变革中,则中国教育学还不可能产生一种内在的话语创新和话语体系建设的需求。只有当我们从根本上克服对外来教育学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的过度依赖时,中国教育学研究才有可能将自己的触角真正伸展到教育变革的探究与实验、经验与问题中去;只有当教育学研究能够真正契合、切近和开启中国教育改革的“新现实”时,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才算是获得了真实意义上的“中国经验”的支撑。

■ 《教育研究》2018年第12期,约15000字